



No. C2002006

2002年3月21日

我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胡书东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为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需求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的结果表明,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财政支出,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

关键词: 居民消费 财政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财政政策

一、引言

自 1997 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困境。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 7% 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在东亚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一枝独秀，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国内需求。这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的主要措施是扩大财政支出。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已经连续 4 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国民经济仍然没有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依然缓慢，一些人已经开始对以扩大财政支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疑虑。¹另一方面，赞成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人则认定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增加内需，刺激民间需求。判断以扩大支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合理，关键要弄清楚我国的财政支出和民间需求之间的真实关系。在民间需求中，最终消费需求最为重要，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国家财政支出或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作较为深入和实证的研究，为人们判断财政支出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其实，政府经济政策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只不过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为背景。至于财政支出或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有若干研究成果问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乘数-加速数原理）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对民间需求和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1980 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的重新兴盛，反对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财政政策的声音又占了上风。不过，在 1980 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中，虽然广泛应用了较为深奥的数理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但是很少做计量检验。1990 年代以来，数理模型和计量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文献开始多了起来，也正因为有了与理论假设不同的经验检验结果，即使是遵循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者内部在对待财政政策的问题上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关于政府购买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两者可以是互补关系，

¹对积极财政政策持保留意见的另一个理由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可能引发的财政信用风险，以及积极财政政策对体制改革的可能影响。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胡书东，2002）。

即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私人消费同方向增加, 这时扩大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起到了挤进的作用 (crowding-in effects)。在日常生活中, 这种情况不乏其例, 如政府投资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为私人旅行与汽车消费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另一方面, 两者也可以是替代关系, 这时扩大财政支出实际上对私人消费需求产生了挤出效应 (crowding-out effects)。当然,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消费之间也可以同时具有替代和互补两种性质。贝利 (Bailey, 1971) 首次提出, 公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 $J(0 < J < 1)$ 单位的私人消费。根据这种假说,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U = u(c + Jg)$, $u' > 0, u'' < 0$, $\frac{\partial(\partial u/\partial c)}{\partial g} = Ju''$ 。这样, 如果 $J > 0$, 就有 $\frac{\partial(\partial u/\partial c)}{\partial g} < 0$, 即政府支出的扩大引起私人消费边际效用的下降, 从而引起私人消费的减少。在这个意义上, 政府消费 (指政府支出, 不同于支出法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政府消费) 和私人消费是替代关系。相反, 如果 $J < 0$, 就有 $\frac{\partial(\partial u/\partial c)}{\partial g} > 0$, 政府支出扩大引起私人消费边际效用增加, 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呈互补关系。巴罗 (Barro, 1981) 将有效消费 $c^* = c + Jg$ 这一关系引入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 Komendi (1983) 和 Aschauer (1985) 各自用美国的经验资料, Ahmed (1986) 用英国的经验资料分别检验了 J 的符号。上述研究表明 $J > 0$, 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呈替代关系。Ahmed 和 Yoo (1995) 在真实经济周期的框架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 Karras (1994) 对世界上 30 个国家的跨国分析表明, $J < 0$ 。Djajic (1987) 和 Ihori (1990) 遵循了另外一种研究路线, 没有事先假定 $c^* = c + Jg$, 而是分别从理论上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临时性增加和持久性增加对私人消费的影响, 不过, 他们没有进行经验检验。

本文希望从比较一般的理论框架出发, 对我国的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我们没有预先设定 $c^* = c + Jg$, 也没有区分政府支出的临时性一次变动和持久性变动。

二、理论框架

假设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生产单一产品, 该产品可以用于消费, 也可以用于再生产或纳税。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_t = u(c_t, g_t) \quad (1)$$

其中 c_t 代表个人消费， g_t 代表政府消费或政府购买，用政府支出加以测度，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政府消费和公共品提供， t 为时间。该效用函数满足通常的凹性和二阶连续可微假定， $u' > 0, u'' < 0$ 。生产函数被假定为

$$y_t = f(k_t) \quad (2)$$

其中 y_t 和 k_t 分别为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 $f_k > 0, f_{kk} < 0$ 。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资本，则新增资本

$$\dot{k}(t) = f(k_t) - c_t - g_t \quad (3)$$

\dot{k} 代表 k 对时间 t 求导。给定初始资本存量 k_0 ，我们可以列出家庭的最优选择问题：

$$\max_{c_t, g_t} V = \int_0^{\infty} u(c_t, g_t) e^{-rt} dt \quad (4)$$

$$\text{s. t. } \dot{k}(t) = f(k_t) - c_t - g_t$$

其中 e^{-rt} 为折现因子， r 为折现率，我们假定 r 为常数。与这一最优选择问题相对应的现值汉密尔顿（Hamilton）函数为

$$H = u(c_t, g_t) + \mathbf{I}[f(k_t) - c_t - g_t] \quad (5)$$

假定消费者无法控制政府购买或政府支出 g_t 的大小，则选择最优化的一阶必要条件为

$$u_c - \mathbf{I}(t) = 0, \quad u_g - \mathbf{I}(t) = 0 \quad (6)$$

共态变量 \mathbf{I} 满足下列条件：

$$\dot{\mathbf{I}}(t) = -\partial H / \partial k + r\mathbf{I}(t) = -\mathbf{I}(t)f_k + r\mathbf{I}(t) \quad (7)$$

为了得出我们需要的民间消费表达式，我们对（6）式中的 $u_c - \mathbf{I} = 0$ 重新安排为

$$\mathbf{I}(t) = u_c(c_t, g_t) \quad (8)$$

（8）式两边对 t 求导可得

$$\dot{\mathbf{I}}(t) = \dot{c}_t u_{cc} + \dot{g}_t u_{cg} \quad (9)$$

分别将 (8) 式和 (9) 式中的 $\mathbf{I}(t)$ 和 $\dot{\mathbf{I}}(t)$ 表达式代入 (7) 式并整理得

$$\dot{c}_t u_{cc} = \mathbf{r}u_c - f_k u_c - \dot{g}_t u_{cg} \quad (10)$$

将 (8) 式视为 c 关于 g 和 \mathbf{I} 的隐函数, 可得

$$c_t = c(\mathbf{I}_t, g_t), \quad c_g = -u_{cg}/u_{cc}, \quad u_{cg} = -c_g u_{cc} \quad (11)$$

将 (11) 式中的 u_{cg} 表达式代入 (10) 式并整理得

$$\dot{c}_t = c_g \dot{g}_t + (\mathbf{r} - f_k) \frac{u_c}{u_{cc}} \quad (12)$$

设 $r_R = -\frac{u_{cc}}{u_c} c_t$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不变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由此可得

$$\frac{u_c}{u_{cc}} = -\frac{c_t}{r_R} \quad (13)$$

将 (13) 式代入 (12) 式得

$$\dot{c}_t = c_g \dot{g}_t + (f_k - \mathbf{r}) \frac{c_t}{r_R} \quad (14)$$

由此我们推导出居民消费增量 \dot{c} 关于政府支出增量 \dot{g} 和当期消费 c_t 的理论表达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资本边际产出 f_k 等于资本要素的价格, 假设其为常数, 政府消费对私人消费的边际影响 c_g 也假定是外生的, 但是 (14) 式的右边包含当期内生变量 c_t , 将 $\dot{c}_t = c_t - c_{t-1}$ 代入 (14) 式并整理可得

$$c_t = \frac{r_R c_g}{r_R + \mathbf{r} - f_k} \dot{g}_t + \frac{r_R}{r_R + \mathbf{r} - f_k} c_{t-1} \quad (15)$$

根据 (15) 式可知, 确定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关系, 关键是看政府支出变动量 \dot{g} 前面的系数符号和数值大小。如果系数大于零, 则说明政府支出的变动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 扩大政府支出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的增长。如果系数小于零, 说明政府支出的变动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动呈负相关关系, 扩大财政支出对刺激民间消费没有作用。(15) 式所反映的即期消费和前期消费的关系也符合人们的直觉和理论逻辑, 消费从长期看是个连续过程, 而且具有相当强的刚性, 前期消费相当程度上和前期收入有关, 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 即期消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前期收入。所以, (15) 式是可以接受的理论方程

式，能够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三、数据和经验检验

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推导出民间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本部分将利用中国的数据资料对这一函数关系进行经验检验，以便验证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及其结论的正确性，并根据经验检验结果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加以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计量检验的需要，我们将(15)式改写为

$$c_t = \mathbf{a} \dot{g}_t + \mathbf{b} c_{t-1} + \mathbf{e}_t \quad (16)$$

其中 $\mathbf{a} = \frac{r_R c_g}{r_R + r - f_k}$ ， $\mathbf{b} = \frac{r_R}{r_R + r - f_k}$ ， \mathbf{e}_t 为残差项。

根据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和现状，再加上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我们使用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资金支出两项加总作为政府支出 g 的度量指标，其中1982年以前缺乏预算外资金支出数据，我们用预算外资金收入数据加以代替。我们用支出法国民收入核算中最终消费项下的居民消费作为民间消费 c 的度量指标。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数据都换算成了1950年不变价数值，假设残差项 \mathbf{e}_t 满足古典假定，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16）式进行无截距项回归分析。为了消除个别年份变异的影响，我们对（16）式赋予虚变量得

$$c_t = \mathbf{a} \dot{g}_t + \mathbf{b} c_{t-1} + dum + \mathbf{e}_t \quad (17)$$

其中 $dum_{1992,1993,1995} = -2$ ，其余年份 $dum = 0$ ，回归结果见表1。

表 1.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关系的自回归估计

变量	自由度	B 值 (参数估计)	标准差	t 比率	Approx Prob (Prob > T)
\dot{g}_t	1	0.225431	0.0578	3.898	0.0003
c_{t-1}	1	1.057422	0.00553	191.072	<0.0001
DUM	1	-112.235758	22.4476	-5.000	<0.00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第238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第258页、第282

页。

注：Reg Rsq (回归 R^2) = 0.9994, Total Rsq (总 R^2) = 0.9994, 这两个值相当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差分析中的 R^2 和 $\overline{R^2}$ 。 g_t 和 c_{t-1} 以及虚变量DUM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双尾t检验。因为我们执行的是自回归程序，所以回归输出的结果并不包含方程估计的总体F值，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方差分析表明，F值=26029.097; F检验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为0.0001, 所以回归分析通过了F检验。模型解释变量包含因变量滞后值的自相关性检验Durbin-h值=0.245703, 杜宾h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4030,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可以接受回归模型残差项 e_t 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的古典假设。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确保我们的回归分析的真实性和说服力，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stationarity) 进行检验。我们对时间序列 c_t 和 g_t 分别执行了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 (unit root test)。结果表明，无论是没有截距项的零均值单位根检验，还是单均值和包含时间趋势变量的单位根检验，都表明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时间序列数据满足平稳性假设，回归分析有效。我们将单均值和包含时间趋势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的F值及其显著性列在表2中。

表2. 增广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

c_t				g_t			
Type	Lags	F	Pr > F	Type	Lags	F	Pr > F
Single				Single			
Mean	0	130.26	0.0010	Mean	0	8.71	0.0010
	1	11.28	0.0010		1	4.54	0.0676
Trend	0	63.81	0.0010	Trend	0	10.84	0.0010
	1	9.71	0.0010		1	6.32	0.068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 页、第 238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第 258 页、第 261 页、第 282 页。

四、政府支出和民间消费关系的政策含义

前面的理论研究和计量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积极财政政策可行性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根据对(17)式的回归分析结果清晰地得出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变动之间的关系。从表1可知,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从整体上看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民间消费的作用是挤进的(crowding-in),而不是挤出的(crowding-out)。

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这种统计关系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从整体上看仍然十分低下,需要填平补齐的地方很多。客观上,私人物品的消费需要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配合,这在现代社会尤为如此。而我国不仅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严重不足,而且法律环境、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等软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与社会得的需求相比差距更大。正因为如此,政府支出和民间消费之间才呈现出显著的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能够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相应增加。这就为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政策空间。只要财政支出能够真正有效改善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就能够起到刺激民间消费需求的作用,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当其时。

然而,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中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财政支出越多越好,一旦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国民经济变得比较成熟),政府支出变动和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并非所有的财政支出项目变动都与民间消费呈正相关关系。我们分别使用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逐年变动的的时间序列数据代替财政预算内外支出逐年变动的的时间序列数据对(17)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将四个回归方程的部分回归结果列在表3和表4中。

表3. 分项目财政支出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自回归估计

变量	自由度	B 值 (参数估计)	标准差	t 比率	Approx Prob > T
经济建设费	1	0.4073	0.1562	2.61	0.0123*
社会文教费	1	1.1737	0.4174	2.81	0.0073*
国防费	1	0.3948	0.2774	1.42	0.1616**
行政管理费	1	0.6474	0.5405	1.20	0.2373**

注: *表示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双尾 t 检验; **表示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10 的双

尾 t 检验。本表是四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而非一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 页、第 238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第 252 页、第 282 页。

表 4. 分项目财政支出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回归分析的序列相关性杜宾 h 检验和时间序列数据增广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杜宾 h 检验		增广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			
	Durbin h	Pr > h	Single Mean (lag 1)		Trend(lag 1)	
			F	Pr > F	F	Pr > F
经济建设费	0.8035	0.2108	9.68	0.0010	10.63	0.0010*
社会文教费	0.4210	0.3369	0.99	0.8201	1.87	0.8049**
国防费	0.8419	0.1999	1.62	0.6665	2.99	0.5945**
行政管理费	0.7080	0.2395	7.41	0.0010	6.38	0.0658*

注：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杜宾 h 检验，回归模型满足不存在自相关的古典假定；*代表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稳态的，回归分析有效；**表示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非稳态的，回归分析无效。本表是四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而非一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 页、第 238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第 252 页、第 282 页。

从表 3 可知，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变动没有通过 t 检验，居民消费和国防费支出变动，居民消费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变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个统计分析结果很容易理解，国防作为一种公共品，虽然至关重要，但是国家防卫职责统一由国家统一实施，跟居民家庭的行为选择没有直接关系，和平时期居民家庭很少能够感受到国家安全与个人消费之间的互补性，所以国家财政的国防费支出也就无从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该不该增加国防费支出，有另外的决定因素，与财政政策没有关系。

从理论上说，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衡量的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投入，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目的是为私人部门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公共品，这些公共品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前提。国家财政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5 年以后，在绝对量上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

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低下却是社会公认的事实，社会治安、法制环境、政府收费等方面，与老百姓的要求差距很大，而且一直没有根本性改善。所以，虽然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很快，但是公共品和服务因为生产效率低下，提供的数量、质量都不足以对居民消费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也就不奇怪了。要真正改变这种状况，恐怕需要下大力气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当我们用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替代财政预算内外支出对（17）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虽然通过了 t 检验和杜宾 h 检验，但是该时间序列数据却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所以参数估计没有意义。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非稳态性反映了几十年来国家对社会文教事业的重视程度和财政的投入力度随机性比较强，没有长期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社会文教事业。比如改革开放 20 年，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就有三个不同的时间趋势，1978-1983 年缓慢上升，1986-1995 年又从 4.75% 下降到 3.00%，1996 年以后，由于执行科教兴国战略，重又上升到 2000 年的 4.90%。²

在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区分的四个分项回归分析中，唯一既通过了参数估计 t 检验又通过了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只有国家财政经济建设支出项的变动，而且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财政向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可以直接增加非农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增加和改善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品供给，降低居民消费的外在成本，同时，也能够降低民间投资的成本和风险，提高民间投资的资本边际报酬，从而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消费起到间接的刺激作用。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向困难国有企业注资，短时间内也有助于缓解企业职工的收入低下问题，从而有助于维持相关的居民消费。当然，从效率角度考虑，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太大，不宜提倡。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消费的财政支出项目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施以扩大财政支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能够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

²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第 252 页。

五、结论性评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以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消费确实能够起到拉动作用。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国民经济总的发展层次还很低，基础设施落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能够直接增加内需，长期有助于夯实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是一项将解决目前问题与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两者和谐统一起来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考虑国家财政风险，单纯从实施效果出发，针对我国当前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实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比较好的政策选择。当然，国家财政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宝贵的财政资金也有一个利用效率的问题，应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财政投资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财政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可以考虑结合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率先在财政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建立起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避免财政投资过程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发生。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新增的，作为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突破口不会受到既得利益太多的阻挠，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另外，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不能为目前低水平上的生产普遍过剩表象所迷惑，宝贵的国家投资主要应该投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努力提高国家财政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大型豪华的剧院、纪念性场馆设施、娱乐场所等与国计民生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投资项目不宜多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事大大超越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需要的大型、豪华基础设施建设，从现实出发，应该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向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农村基础设施和中小型项目倾斜。

参考文献

- Ahmed, Shaghil and Byung Sam Yoo, 1995, "Fiscal Trend in Real Economic Aggregat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27, Issue 4, Nov., 985-1001.
- Ahmed, Shaghil, 1986,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7, 197-224.
- Aschauer, David Alan, 1985,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 Economic Review, vol.75, Mar., 117-127.
- Bailey, Martin J., 1971,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 McGraw-Hill.
- Djajic, Slobodan, 1987,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Optimal Rates of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0, Aug., 544-554.
- Ihori, Toshihiro,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3, Feb., 60-69.
- Karras, Georgios, 1994,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26, Feb., 9-22.
- Komendi, Roger C., 1983, "Government Debt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 Vol.73, Dec. 994-1010.
- 胡书东: 2002,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影响", 《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英文题目: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Demand in China

本文为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需求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的结果表明,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财政支出,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theoretic framework with a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is provided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the Active Fiscal Policy on private consumption demand in China. Theoretic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expans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uld contribute to stimulate private consumption demand.